

## 邁向遺忘？—— 對台灣若干兩岸經貿研究的初步檢討

史豐榮\*

德明技術學院國貿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試圖從台灣的兩岸經貿研究文獻中，抽取一些深具影響力、且目前正持續被教科書所予以引述的著作，進行簡介與方法論上的內部批評；這些具有關聯的代表性著作所採用的理論架構具有某種特點，即將台灣資本外流中國對前者國內產值的影響予以淨效果評估。筆者除了鋪陳此理論模型所歷經的些許改造外，並將針對目前仍被普遍接受的關鍵假設作出檢討，以說明：原本不甚起眼、似乎頗為自然的假設修正，卻已為該理論架構之逐漸「無足輕重化」埋下了伏筆；其影響所及，不但無法排除將外流資本視為國際間之「自由財」的可能，實則導致該架構淪為兩岸經貿研究中「櫥窗展示」之用的角色，並使這些著作於理論與政策面向上的重要性旁落。本文的重要主張之一乃是：基於現今機會成本概念的重要性，對此概念的澄清將有助於凸顯外流資本之替代國內投資的程度並無法模糊化——更具體的說，該替代程度應視為百分之百——並且在推估台灣產值的淨增減上，本文的文獻對象便無法導出「無法於事前確切得知資本外流中國所影響台灣產值增減之淨效果」的結論。也因此，結語部分將簡短地提出有待發展的若干論點，用意除了延續這些文獻的持續攸關性外，並初步闡述在何種意義上台灣必須容忍資本外流，但赴外投資可能轉向流入中國之現狀，並不宜被擴大引伸成戒急用忍政策即應全面廢除。

**關鍵字：**兩岸經貿、資本外流、機會成本、戒急用忍政策

---

\* 史豐榮，政治大學商學院學士與社會科學院碩士，後於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獲得博士學位（2001）；研究興趣為馬克思學、政治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學方法論，近年所教授課程集中於經濟學與兩岸經貿研究。感謝匿名審查人通篇的仔細閱讀，與其深入的批評及建議，使筆者進而改寫若干原本略顯模糊的段落；現有格式、內容推論上任何尚存的可能缺失，自仍應由筆者負責。本文獻給早逝的系內同事——黃清政博士。通訊方式：台北市114內湖區德明技術學院國貿系；fjshih@anet.net.tw。

## 壹、前言

自台灣政府於 1980 年代末期鬆綁兩岸人民交流的限制開始，台灣學界對於兩岸關係內經貿相關議題的處理焦點，逐漸由早期之兩岸應維持或發展何種貿易型態，而轉向成台商／台資赴中國之大型直接投資（direct investments）是否應該給予嚴格限制的論辯<sup>1</sup>；這當中，雖然引發國際經濟學中跨國投資究竟會否取代貿易往來的印證機會，卻也突顯了兩岸經貿往來關係的「深化」，所帶給台灣政經、社會甚至心理層面的種種刺激，與隨之誘發的多重焦慮。諸如：產業西進是否源於台灣國內「投資環境惡化」，抑或資本外流導致了產業「空洞／空殼化」；夕陽產業移轉至中國，究竟代表國內產業升級相對成功的結果，抑或是國內產業升級大幅趨緩之果；又如台商之相對集中於中國，究竟代表企業經營精神與衝力的成功延伸，抑或企業淪為特定意識形態宣傳或政治權謀下不知情的工具角色——凡此種種盡皆說明了：兩岸經貿關係並非吾人平日習以為常的跨國經濟交流網絡，其複雜性也非一般國際經濟理論中隨處可見的兩國模型所能盡述；同時，倘若吾人因而並不侷限於「台灣赴中國投資僅是台灣所有赴外投資總額下的（稀鬆）平常項目」的觀點，那麼台商之赴中國投資，並不是一般視企業（決策者）可以自主——且因而「自受」（self-bearing）——的跨國投資，而是牽動政府以各式政策施展可能阻力的獨特投資行為<sup>2</sup>。

---

<sup>1</sup> 直接投資於此乃指「赴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唯資本流通途徑則有可能採取間接進入地主國（host country）的方式；而台灣學界內定義此等間接投資之充要條件乃為途經第三國／地。在種類、金額上對大型資本外流中國的限制，即稱「戒急用忍」政策；近四、五年來此政策有所鬆綁，但其基調不變——請參考衛民（2002：206-11、405-7）。

<sup>2</sup> 瞿宛文（1999：74-79）對投資環境惡化說有著少見的明智批駁，但當她（頁 92-93）點出台灣政府一方面力舉「根留台灣」的旌旗，另一方面卻（矛盾地？）對台塑企業之投資美國似乎——「根不留台灣」——不甚關切時，這反倒說明了根留台灣的呼籲實屬「戒急用忍」政策之一環，且對台灣政府而言，赴中國投資與赴美國投資的「定位」相異，也因此根留台灣的呼籲與適用對象**不涉及**後者。

分析這獨特之赴外投資對台灣的可能（與實際）影響，在台灣的兩岸經貿研究中可謂比比皆是、琳瑯滿目；本文即試圖從中抽取出一些目前正持續被「納入教材」的文獻，進行簡要的介紹與方法論上的內部檢討<sup>3</sup>。依筆者之見，這些向來公認具有代表性質的著作，雖然再三被（為數尚不算多的）兩岸經貿——或舊時代所誤稱之「大陸經貿」——教科書所引用、闡述，但其內部主要的理論架構實已歷經精巧的修訂（revision）。除了在接下來的第二節之中，分兩個部分來概述這些發展外，誠如本文標題所暗示的，第三節將引申出下述的論點：在這些原本不甚起眼、似乎頗為自然的演化式修正中，一個關鍵的作法——即將外流資本替代在台投資的程度予以模糊化——卻已為該理論架構的逐漸「無足輕重化」（trivialization）埋下了伏筆；其影響所及，實則導致該架構淪為兩岸經貿研究者行文當中純粹點綴之用的修飾性角色。即使所佔的篇幅依舊，這些過往文獻在理論與政策面向上的重要性已然旁落；倘若吾人不願正視其內的這一修正並非無懈可擊，則不但該修正已然「鵲佔鳩巢」式地取代了整套架構原本的地位，邁向淡忘的趨勢與過程似乎已然是這些著作所將面對的最終實質走向。

不過，對於筆者此一論點的可能回應乃是：正是因為此一理論架構不

---

<sup>3</sup> 納入教材亦即一般的「教材化」用語，似乎沒有相近的外文字彙可以用來傳達筆者的意思。方法論——請注意，此非指一般習以為常的研究法（research method）——則偏重以「理論／模型建構歷程」、「假設應否趨真（realistic）」為主要的重點，再額外根據筆者目前較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國際）經濟學思想史——來予以支援。本文匿名審查人所提出之「轉換…典範」（paradigm shift）的建議，筆者目前仍傾向認定其屬於方法論上的「外部批評」；筆者並不排斥這種作法，實際上並早已開始進行相關的論著工作——但此處只能先請讀者參閱本文之註 25, 34 與 39。最後，本文將不對理論與模型作區分，雖然在方法論的討論中這是項難纏的重要課題——參閱 Hands (2001: 310-12, 341-52)。Hausman (2001: 311-12) 就提到（連）Milton Friedman 其實都將理論與「假說」（hypothesis）等同並用；而在檢討貿易自由化或進口鬆綁政策是否真能引發成長、增強經濟表現的諸實證文獻時，Deraniyagala and Fine (2001: 817) 則區分了程式（equation）、模型與理論三個層次；最後一例為 Boland (2002: 611)，他在說明經濟計量模型或模擬（simulation）實難擺脫其內在限制的脈絡下，提及「[...]模型用來表達將可觀察到的變數予以相互聯繫起來的…理論」。

斷曝露出些許的侷限性——因而需要改造——或者對該架構的改良亦有最終的限制存在，所以即便目前的「櫥窗展示」（window-dressing）角色，也是對其曾有的歷史或典章地位的尊重。在鋪陳幾位學者對某些假設與模型建構細節的逐步修正後，筆者將積極說明的正是：雖然筆者無法證實此一修飾性角色的形塑，究竟屬於「蓄意或非蓄意的結果」（intended 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台灣兩岸經貿研究內早期所出現的某種明確結論——赴中國投資對台灣弊大於利——不但不易為改良後的（理論）假設與模擬（simulation）所推翻，目前普遍視為極其合理的最新（the latest）、最受認可的假設，恐怕也與常見、但必須加以澄清的經濟學學理——特別是指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s）概念——相左<sup>4, 5</sup>。雖將過早批露理應居後的內容，此處適合具體地預作交代：台灣外流中國之資本不但不應以「自由財」（free goods）待之，衡量資本外流的影響時更應以其外流之全數金額為準；同樣的，經筆者所關注、檢討的這些研究文獻，其不但便無法導出「無法確切得知資本外流中國之影響台灣國內產值增減淨效果」的結論，想反的，推估出來的淨效果乃為負面／負數！

為了避免某些極有可能出現的誤解，筆者第二、三兩節的內容並非（自我）定位為將這些作為檢討對象的文獻一次徹底地「推翻」（demolish）殆盡；本文之實際進展或可自承為一種迂迴的試驗性作法，即：(1)說明前述理論框架的發展已有所偏斜，但該架構若獲得澄清後的學理支持，則台灣的 GDP 顯然受到資本之外流中國所拖累；(2)也因此，該架構的可能出路與延伸不但不在於產值的淨增減無法得知，實則在於台灣政府當局的管制政策並不缺乏內在的合理性。可惜，部分的兩岸經貿研究者不察於此，故

<sup>4</sup> 雖然脈絡稍異，但此處所提的經濟學也正等同於 Hausman (2001: 311)所寫的：「『經濟學』[於此]應被指為『主流經濟學』(mainstream economics)」；Hausman 在該文稍後的篇幅 (322-23) 中才用到「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 一詞，而他仍一貫地正確主張：實證經濟學擺脫不了「規範的要素」(normative elements)。

<sup>5</sup> 另外請注意到：本文中（後詳），若吾人追隨所處理之文獻對象的一般脈絡，那麼或許其模型架構的修改確有其最終限制在；不過筆者認為這一可能的臨界「終點」要比多數文獻所認定的提早許多，原因即出在對機會成本概念的澄清之上。

多半額外另採「企業之出走決策需獲（完全的）『尊重』」、「資本外流不勞政府部門（惡意地？）費神因應」的主張；由於這依舊脫離不了百般依從於自由經濟論調的罩門，因此本文最後的結語部分將直接、但簡短地提出有待日後深入發展的些許論點，一來用以延續本文之文獻對象的持續攸關性，並藉以疏解極端的「管制即惡」之成見，二來並進一步說明在何種意義上台灣必須容忍<sup>6</sup>資本外流，但赴外投資可能轉向流入中國之持續現狀——這當然包括了戒急用忍政策可能部份失效的事實——並不宜擴大引申成該政策即應全面廢除；特別是資本主義式的實際發展，向來並不同於自由經濟的全然「去管制」（deregulation）夢想。

## 貳、些許文獻與理論架構

### 一、

如前所述，台灣的兩岸經貿研究可謂汗牛充棟，那麼本文所要討論的對象要如何地加以界定呢？不可諱言的，在以下作為關注對象的研究文獻內，無論在前提預設、推論過程與經貿／產業政策建議上，各個不同作者或著作之間或許均存在著若干細微、而可放大檢視的差異（nuances）；不過，依筆者主觀——但應接受檢驗——的設想，它們卻都能被歸類為立基於某種基本的理論（或模型）架構之上。而此核心正是：設法將台商外移／投資中國對台灣的影響，予以淨效果評估（net effects evaluation）；倘若

<sup>6</sup> 筆者這裡使用的是容忍二字，而非「尊重」或「不得干預」。不論統獨立場為何，台灣絕大多數的經濟學者均好稱台灣為「自由經濟」體；而筆者在教學（相長的機會）中便一再觸及與學生們一同探究：以強烈尊重個別經濟行為者之自由決策權著名的經濟學者，卻／確能由於兩岸間的獨特性，而在兩岸議題上轉為支持經貿管制／管理。這跟 Deraniyagala and Fine (2001: 809-10) 所提到的下述事例頗可一併思考：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者 Anne Krueger 把「美國國內[竟]還有經濟學者排斥自由貿易（理論/政策）」當作經濟／貿易思想史的一個問題（question）處理。

利大於弊，則應是符合國際間產業分工（*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的一般預期效果；但若弊大於利，則台灣政府往往才被賦予某些政策實施的正當性<sup>7</sup>。不消說，這般淨效果評價的作法<sup>8</sup>並不稀奇，甚至有些「陳腔濫調」（*platitudinous*）；畢竟，國際間的資本流動對收授雙方各自來說，絕不會是種有利而截然無弊——反之亦然——的單純影響<sup>9</sup>；因此，如何評估利弊自是重要／重點。接下來，筆者即針對一些具有前後關聯——而這一性質並非筆者所自創，高長（1997：第7章）與任克敏（2002：第4章）均作如是介紹——的重要文獻略作敘述，隨後並予以檢討。

根據學界目前的文獻來判斷，張榮豐與史惠慈（1989）之研究專書內所採用<sup>10</sup>的下列模型／公式，儼然曾為若干後續——特別是與國內著名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這一智庫機構密切相關之——研究的起點：

$$T = \lambda \cdot A \cdot (Y^{cn}). \quad (1)$$

<sup>7</sup> 可先參酌高長（1997：173-175）。此處並不意謂著當研究結論出現利大於弊時，政策建議不會出現；不過這類建議應當正是 Milberg（1996：252）所點出的：「…蛋糕上的糖霜」。

<sup>8</sup> 在以中國為地主國焦點的晚近討論中，瞿宛文（2005）寫道：「…外資影響有正面有負面，但是若真要評估外資的功過，恐非只是將正負影響抵銷下來…就可以得到答案。[…畢竟]靜態的加加減減算帳式的評估恐怕用處有限」。若將這觀點運用到本文的主題上，筆者也相當同意；不過，除非爾後台灣的兩岸經貿研究不再理會本文所處理的過往文獻，那麼淨效果評估後的明確結論一樣必須嚴肅面對。John Gray 這位（新）保守主義者在批判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時，不正是一個值得如此追隨的典範？

<sup>9</sup> 但容筆者提醒：(1)在國內至今為止的資本外流中國的爭論中，也經常出現高度頌揚其利或宣揚其惡的對立局面；(2)西方（主流的）國際經濟理論較習於忽略當資本接受國並非「先進國」、且其國內的特殊環境或政策考量不可漠視時，其可能遭受的負面影響——可比對瞿宛文（2005）對巴西的討論；(3)根據當今國際貿易理論內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的推論與引申，若「後進國」與先進國間依循既有的貿易原理而建立分工體系，則前者國內的薪資或所得分配差距將會縮小——不過，這一原始推論的實現程度目前顯然極其之小（Milberg, 1999: 105-6）。

<sup>10</sup> 本文以下篇幅所舉列的各項式子皆不必然與各文獻的原始版本一致；除了已然簡化外，為了行文方便，筆者並作了統一的改寫。同時，由於這些程式本不同於一般以求取受限之均衡解為目的的模型作法，因此應無細分外生或內生變數的必要；雖然依照這些程式的寫法，等式右手邊的某些符號很容易被視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其他則為參數或係數（*parameter or coefficient*）——見 Boland（2002：618）。

上式中， $T$  為  $n \times 1$  的行向量，指出口貿易額； $Y^n$  亦為  $n \times 1$  的向量（上標  $cn$  表示中國），意指台商於中國的產值； $A$  則為  $n \times n$  之方陣，即指「技術係數矩陣」（matrix of technological coefficients），其內的元素  $a_{ij}$  代表一數額單位的第  $j$  財之生產，所須使用到的第  $i$  財投入量； $\lambda$  則為某一代表比例的純數。

此式之內容所表達的意義為：台資位於中國境內之  $n$  個產業部門的產值向量若為  $Y^n$ ，則  $AY^n$  向量即為台商因生產該產值而需投入的原材料與資本/中間財；當台商回頭向台灣購入這些投入項的數額乃佔  $AY^n$  的  $\lambda$  比例時， $\lambda AY^n$  之值<sup>11</sup> 正是台商投資中國後，得以誘發／衍生（induced/derived）的台灣出口貿易額——故  $\lambda$  亦稱為回購比例。由於  $Y^n$  之內元素在此不可能為負數，且就算  $A$  所表達的技術型態是為「非具生產力」（unproductive）<sup>12</sup> 的，但只要  $\lambda$  為正數， $T$  內的各值（與其加總數）也將隨之呈現正數；因此是謂誘發之出口貿易對台灣產值或所得的貢獻。

不過，讓我們首先留意到，就一般總體經濟學的學理而言，上述將該筆貿易額計入產值的作法，其實只有當吾人採用「國內生產毛額」（GDP）——而非「國民生產毛額」（GNP）——來估計產值（或最終產品（final goods）的市價總和）時，才有其合法性；否則，在 GNP 的概念下， $T$  應視為必須避免「重複計算」（double counting）的非最終產品。換句話說，

<sup>11</sup> 應再請注意的是： $T$  於此乃指稱衍生出口，而這涵括了兩岸間的直接與間接貿易型態；後兩者的定義與分析參見：衛民（2002：114-15）。此外，經濟學的教本多半宣稱資本財與原材料的地位不同，可惜本文的主題與篇幅無法處理此種誤解。

<sup>12</sup>  $A$  內元素之如何透露出該技術具有生產力，有其特定的數學／數理要求；此處吾人僅需以常理設想：某一特定生產部門之產出一數額單位的產品，若卻需使用到至少一單位的「自身產品作為投入項」（its own product as an input into itself），則該部門顯然不具生產力；或者， $A$  所代表的整體生產體系所得出的各（毛）產出，卻小於或等於  $A$  內的各投入總額，則該體系亦不具生產力。此外，正文稍後的段落將使我們發現：由於  $T$  這筆數額必須是在採用 GDP（國內生產毛額）來計算產值的前提下，才能視為合法計入最終產品／產值內的貿易額，因此——其他條件不變（*ceteris paribus*）下—— $A$  若愈是不具生產力，卻愈能增長誘發的出口貿易額。不消說，兩岸關係內的若干禁忌，無形中使得這項課題在台灣學界裡欠缺正面的處理，更遑論  $A$  取自何處。

台商無論以資金轉戰世界何處，只要其（最終）產值為正，則台灣的 GNP 內也就包含了其貢獻的產值，且這無須計入對外投資所回頭誘發的中間投入財出口額；因為無論後者的金額數量為多少，皆非 GNP 所指涉的最終產值。同樣的，某國籍國民之以資本赴外投資，也只有在 GDP 的架構下，才會對其母國國境內造成負面的影響；否則，對外投資後之（最終）產值將依舊計入母國的 GNP 之內。

如果上一段的討論基本上無誤，那麼或許十多年來台灣之逐漸成為資本外流國的實際現象，確能用來作為國內某些教科書改以 GDP 為焦點，來討論國民所得會計帳之各種所得指標的佐證。只是，上面的分析並不意謂著張、史這兩位作者於提出式(1)後，便緊接著推演出投資中國之對台灣 GDP 增減影響的估計；實際上，這兩位學者接下來的焦點乃是台灣因此減少的就業人數推估<sup>13</sup>。這固然是個極其重要的課題，但吾人若暫且作些時間上的跳躍，而由後續的研究文獻——即本文隨後幾段的內容——往前回顧，則在式(1)與（相對）完整的產值淨效果評估之間，顯然還有一段差距存在。同時，受限於兩岸間當時取得實際／實證資料的困難，彼時台商位於中國境內的技術型態（A）其實乃「不可考」（undetectable），因此作者們實際上取用了台灣國內本身已有數據資料可供參考的 A 值以為替代。再者， $\lambda$  這一純數也經兩位作者設定為 100%；如此一來，便如同台灣 GDP 所受影響的利多面盡出<sup>14</sup>。另外， $Y^n$  的求算乃藉由中國官方所公佈的台商協議投資金額，再搭配上與各產業於台灣國內的「資本生產力」數據相乘

<sup>13</sup> 這兩位作者對失業人口數的推估大約在 14,180 至 18,900 之間；不過在筆者接下來將會引用到的其他著作中，此類估計似乎不再出現。如果搶先由本文居後的結論往前回顧至此，這是否代表本文所關注的文獻對象從此又額外假設失業者必定極快速地覓得新的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充分就業是常態——呢？筆者尚無法判斷；這當然牽涉到台灣國內投資環境是否惡化、或為何惡化的老問題。但本文倒數第二節將證實：此處的理論架構實際上由於必須設定「外流中國之資本百分之百地替代在台投資」，（因外流而）失業者隨即有國內其他就業機會彌補的假設更加嚴格不已，也與一般對「投資環境惡化導致產業出走」的抱怨相抵觸。

<sup>14</sup> 高長（2001：147-48）一文內簡述了台商早期投資中國時  $\lambda$  可能偏高的理由；至於愈「接近現實」的  $\lambda$  值如何帶入模型中，則後詳。

運算而來；但協議金額一向過高，且國內資本生產力數據的使用又明顯地與研究赴外投資的實況不符。可見，撇開  $\lambda$  不談，當時  $A$  與  $Y^{cn}$  的可用數據要不是得自於其他替代的來源，就是可信度極低；不消說，這些均是台灣隨後兩岸經貿研究所需跨越（或揚棄？）的限制。

這當中某些後續研究的內容，在高長（1997）的專書——特別是第七章——中有著可信、雖或稍為簡略的解析；此處吾人僅需注意到：縱使所能掌握到的資料／數據有限，1980、1990 年代之交的研究結論可以說多是：「[台]商到大陸投資對台灣總體經濟的發展弊大於利」（高長 1997：頁 156）！如此明確的結論是否能與上一段所提及的「不甚實際」的模型假設與推估相互證成<sup>15</sup> 呢？顯然的，嚴宗大、林昱君與鍾琴（1992）的研究報告是個里程碑；而他們便認為：要估算赴外投資的正面貿易效果、及對國內產值可能變化的影響，除了須持續關注上述的  $\lambda$  值外，應進一步考慮外移的技術狀態、各產業之前後關聯程度、使用國內投入之比例多寡等重要因素。下面的公式即自該研究中簡化而來：

$$T = A \cdot [K \cdot (P^{cn})] \cdot \delta \quad (2)$$

$$Y^{fn} = B \cdot [T - K \cdot (P^{fn})]. \quad (3)$$

在這兩個式子中，方陣  $K$  乃由各部門台商於中國的實際投資額向量（ $n \times 1$ ）所改寫而來的「對角矩陣」（diagonal matrix）， $P^{cn}$  亦為自台商於中國的資本生產力向量改寫而來的對角矩陣， $\delta$  現為向量（ $n \times 1$ ）、但與前述之純數  $\lambda$  意義相同；方陣  $B$  乃是產業關聯表中，用來剔除生產之使用進口

<sup>15</sup> 如此發問就表示：假設的「真實與否」（‘realism’ of assumption）確實很重要——雖然如文後將交代的，起碼就本文主題而言，假設之趨實（realisticness）確有其限制在——而不是如 Milton Friedman 的徒子徒孫們所宣稱的不但假設越虛假越優越、且只有預測力才能判斷理論之優劣良窳。國內已經開始有教科書體認到這一點，不過所有教本的方法（論）首章內，卻千篇一律地只有 Friedman 一角；這種連 Lawrence Boland 都為之謂嘆的「儀式」（ceremony）之舉，其實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當今多數經濟學者的實際研究與教學作為主要乃受 Paul Samuelson 所制約（見 Mirowski, 1989: 175-91, Hands 2001: 60-61）；更同時迴避了 Friedman 原本並未提及解釋（力）可以作為‘the proof in the pudding’的這檔事。

品時對產值的波及效果<sup>16</sup>，上標  $tw$  指稱台灣的  $P^{tw}$  向量 ( $n \times 1$ ) 則代表台灣國內各產業的資本生產力；最後， $Y^{tw}$  表達了 GDP 所受影響之增減後淨值。

經過這些增添後， $T$  的意義基本上仍與式(1)相同，不過現在乃源自於三個要素：中國當地台商本身的資本生產力 ( $P^{cn}$ )、實際投資額 ( $K$ ) 與回購比例 ( $\delta$ )；因此最起碼  $K \cdot P^{cn}$  應屬「甚為實際」的台商於中國國內的 GDP。但由於  $T$  僅為影響台灣 GDP 增減的正面貢獻而已，是故式(3)可謂藉由在設算出  $K$  原本若留駐<sup>17</sup> 於台灣之可能產值——即該資本額與台灣各產業資本生產力 ( $P^{tw}$ ) 之乘積——後，將這可能產值與  $T$  合併起來求取淨額，以得出  $Y^{tw}$ 。那麼這三位作者根據上兩式所得出的 1990 年實證估計結果為何呢？首先，台商投資中國誘發了台灣出口 7 億美元（即  $T$  內各元素值之和——以下皆雷同）以上，且這筆出口貿易額進而使台灣 GDP 增加將近 15.5 億美元（即  $BT$ ）；不過，台商投資中國則使得台灣國內產值減少近 42.5 億美元（即  $-BKP^{tw}$ ）。因此淨效果 ( $Y^{tw}$ ) 實為將近負 27 億美元之多（嚴宗大、林昱君與鍾琴，1992：232）！

這樣的結果或許並不令人意外，畢竟式(3)填補了利弊評價的若干缺口，提醒吾人實應避免過分看重  $T$  這一衍生出口的貢獻<sup>18</sup>；然而，先前的

<sup>16</sup> 對此一個不錯的介紹：D. Wade Hands, *Introductory Mathematical Economics*, 2<sup>nd</sup>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ec. 6.5: 'The Leontief Input-Output System'; 依筆者之見，在 GDP/GNP 的理論定義與國民所得會計帳必須扣除進口額的「實務」作法之間，實有彌補不了的鴻溝。另外，高長（1997：156-57，式(2)~(4)）一書內所用的公式在投資額與資本生產力的向量、及矩陣前後相乘的階數（order）安排上，似乎有所失當。

<sup>17</sup> 留駐之義目前還甚模糊，這點隨後將會論及；不過資本外流於此就表示了原先的國內可能產值因而逸失。

<sup>18</sup> 嚴宗大、林昱君與鍾琴（1992：241）並觀察到自發性需求在兩岸間的重要地位，因而提及「『投資帶動出口貿易之說』，亦不宜過度誇大渲染」；可惜，傅豐誠（2001：10-14）雖然強烈抨擊戒急用忍政策，但其文章內的某些篇幅似乎適為此例。傅文（頁 12）還直接將衍生出口與台灣（曾有的？）產業「升級」聯繫上：「台商赴大陸投資…但也帶動了對國內機器設備及原材料的需求，大體看來，在 90 年代台灣的出口成長及產業升級均取得了明顯的成績，表三[之台灣出口貨品結構分類]的數據顯示產業空洞化…在過去十年並沒有發生」（強調者為筆者所另加）。但我們實應留意到：「產業成長不等於產業升級，而產業升級才能促使產業有本質的變化」（許松根，2000：4）；那麼，衍生

提問於今同樣亦無法迴避之，即：明確得似無法漠視的結論，是否亦能與「不甚實際」（高長，1997：157）的模型假設相互輝映呢？首先應即補充的是，相較於式(1)之將  $\lambda$  設定為 100%， $\delta$  此處乃以向量的姿態現身，似乎更具說服力；但實則不然，因為這三位作者主要——雖然額外的依照「[調查/]抽樣結果作[由 100% 往下之]調整[與模擬]」——仍將  $\delta$  之內的元素均設立為常數（嚴宗大、林昱君與鍾琴，1992：225-26），且「任何一個產業…[之]採購比例（包含同一產業[內]的回購）都一樣」（高長，1997：158；強調者為筆者所另加）。此外，資本外流值真的會全數／全部影響國內原有的可能產值——即  $KP^w$ ——嗎？試想一個熟悉的案例：2003 年左右，台北博愛特區盛傳挖掘出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所埋藏的黃金，而這些黃金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應該從未見過天日，所以根本與任何當下的生產性經濟活動——此即一般總體經濟學內所定義的投資——不會有過關聯；其若外流，則或許在計算台灣國內產值因此可能的損失之前，吾人應該認真地發問：這是筆該算的帳嗎？

## 二、

在這些背景與改良模型的企圖下，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另一位研究人員——高長——與幾位學者自 1992 年起（任克敏，2002：213，與該頁之註 77），便開始從事長達 5 年的（受託）專案研究；據高長本人的二本專書（1997：164-65；2002：第 12 章）所述，下面這兩個式子可以簡要地表達出該研究的基本構思<sup>19</sup>：

---

出口的成長會導致台灣產業的本質變化嗎？最後，傅文（頁 14）還有個特點：對台灣政府無法防堵或甚至——以「鎖國」（？）來——加重產業投資（環境）惡化的抱怨，卻能與頌揚 20 世紀最後十年——這當中包括了正式實施戒急用忍的五、六年光景——之產業升級順利相提並論；筆者不禁要問：投資環境惡化能造就產業升級嗎？學界向來刻意分開處理的兩個論據——投資環境惡化導致產業出走、資本外移且能促進產業升級（故投資環境惡化最終能造就產業升級?!）——不也正是這般怪異的邏輯？

<sup>19</sup> 這些專案似乎均經經濟部投審會委託，但本文將不進一步深究該專案的原始版本，請逕參見高長（1997：第 7 章）。此外，高長等幾位學者尚主張：導致衍生出口的台商中

$$T = A \cdot [K \cdot (P^{cn})] \cdot \delta \quad (4)$$

$$Y^{tw} = B \cdot [T - (s \cdot K) \cdot (P^{tw})]. \quad (5)$$

相較於式(3)，如今最為獨特的增添迨為  $s$  這一個純數，而其所代表的意義實則傳達了當今經濟學內令人耳熟能詳的機會成本概念；於此，資本外流這回事不必然會減損流出國之 GDP，除非該外流與母國國內的「資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 間具有替代關係存在。理論上初步來看，倘若外移之資本  $K$  乃全數自國內原有的產業中「抽身」<sup>20</sup> 而出，則對 GDP 的負面影響就將能歸咎於  $K$  之全數（程度）——因此式(5)中， $sKPt_w$  的向量將可直接寫成  $100\% \cdot KPt_w$ ；相反的，外流資本  $K$  倘若屬於原先與母國國內任何生產性經濟活動無關的資金，那麼  $sKPt_w$  的向量即驟降為  $0 \cdot KPt_w$ ，而這當然意謂著資本外流別無任何傷害可言。由此可知，式(5)中的  $s$  值乃被設定介於 0 與 1 之間，且此封閉區間 ( $0 \leq s \leq 1$ ) 內的最大與最小值，也就分別表達了完全替代與完全無替代性（任克敏，2002：232），用意在權衡外流資本——透過資本之原有國內生產力——最終對減損國內產值的潛在威脅程度；若  $K$  中愈多比例乃抽離自原先的國內生產活動，傷害愈大，但若該比例愈小，則反之。

鑒於機會成本概念於今風行草偃的地位與重要性，式(5)的設立似乎應當頗為符合經濟生活的實況、及當今經濟學學理的嚴格要求；但據高長（1997：170）所述：「由於缺乏實證數據…[因此需藉]假設各種可能的[ $s$ ]值，[以]模擬推估其對台灣國內產值的影響」。雖然如此，但在往下引述這一推估結果之前，我們不宜忽略了：與以往相比，上該研究實已蒐集到較為廣泛與全面的數據，因此不但  $\delta$  值持續由受訪台商回報、整理而得，舉

---

國產值，應由其投資總規模來求算，而不同於以（年度）實際投資額 ( $K$ ) 來求算 GDP 的可能減損；本文將略過此點。

<sup>20</sup> 這也就是衛民（2002：33-34）所引的**外移與擴張之對照組**內的外移義；此時外移指移轉整體原有生產陣地至中國，擴張則為企業額外於中國設廠；本文多不使用這一對照組。

列出來的回購資料也另行細分成機器設備與原材料兩項<sup>21</sup>；但話說回來，若  $s$  值的資訊先天不足，則由模擬而來的結論內容與其價值如何呢？以 1993 年為例，式(5)中的  $BT$  值約為 31 億美元；當  $s$  先以 100% 代入模擬時， $B(sK)(P^w)$  的數值約為 143 億美元，故  $Y^w$  接近負 112 億美元之多；另一方面，若設定  $s$  值為 10%， $B(sK)(P^w)$  之值將降成約只為 14 億美元，而此時  $Y^w$  乃呈現（正）17 億美元的光景。

同時，根據這幾位學者的模擬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使  $Y^w$  為 0 之  $s$  的臨界值約在 20% 左右（高長，1997：168-70）；搭配上本文前兩小段的解釋，這就意指當  $s$  值突破 20% 以上時，台灣國內的產值將「入不敷出」，因為國內的資本形成將被資本外流所殃及，致使外移資本所能衍生的出口貿易額被吞滅殆盡；故  $s$  值唯有跌落於 20% 以下時，GDP 之淨值方為正數！更重要的是，這主要乃針對  $s$  所作的模擬，其價值（或用意）為何呢？答案就是這幾乎顛覆了之前明確得似無法<sup>22</sup> 加以否認的諸研究結論！現若吾人無法確認台資之外流中國到底有多大程度替代了在台投資，那麼只依照固定於 100%（或某一常數（向量））的  $\delta$  值、或只強調外移之  $K$  值的影響必然是其外移數的全部程度，就逕而作出利弊得失（的政策）主張之舉，其實頗不符合「無法直接判斷傷害有多大」的「實情」；這也正是高長（1997：177）所明白表達的意思：「淨效果到底如何，基本上無法在事前根據理論加以推測」<sup>23</sup>。對此，我們不禁滿腔狐疑地自問：容或這是混沌／複雜世紀（Centuries of Chaos/Complexity）下，台灣需因應的兩岸經貿交流／發展的最新情勢？

<sup>21</sup> 按理來說，理論模型內的  $\delta$  也應設法隨之調整為矩陣、且移動公式內的位置。

<sup>22</sup> 但書正是 Friedmanian 的「假設（是否真實根本）無關」說；見本文前註 15。

<sup>23</sup> 強調者為筆者所另加；「事前…推測」在此不宜理解成 Friedman 原始所關注的「對尚未發生／觀察到的現象的事前預測（力）」。

## 參、「香火中斷」與／之機會成本

環顧國內目前為止的文獻，這些以外流中國的資本之如何正反向地影響台灣 GDP 增減為焦點的理論，似乎已經不再獲得將其繼續發展下去的青睞眼光；如果任克敏（2002）專書內第四、五兩章的整理有其及時與可靠性——筆者其實特別歡迎針對此類焦點之文獻搜尋上的指點與協助——其所舉列出來之晚近的相關研究文獻，確實也僅止於 1996 年而已。這不禁令人懷疑：為何在兩岸關係持續展現張力（tension），而兩岸經貿是否呈現互賴（interdependence）<sup>24, 25</sup> 亦隨時引發爭辯的新世紀之始，曾經如此一脈承襲下來的基本架構，似乎無法獲得繼續延展的機會；莫非其內在有

<sup>24</sup> 除了資本外流外，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degrees of dependence)之攀升將屆 30% 也引起廣泛的注目。任克敏（2002：190）的下述主張有其正確性：「[我們]不能僅簡單[的……]以為台灣輸往大陸佔台灣出口的比重不如大陸自台灣進口佔大陸總進口的比重，[便]推論大陸對台灣的依賴度相對較台灣對大陸的依賴度為高」。但這適足以對照檢驗高長（1994：250）原先的部份推論，因為依賴度之間的比較只適宜以某特定國家為固定分母項，分子項則為該國對其不同貿易夥伴的進／出口或貿易總值。雖然瞿宛文（2003：207）曾提及（貿易佔產值之對外）依存度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在稍早討論全球化的重要文章——〈全球化與後進國之經濟發展〉（前揭書：7、19）——中，她也不也多次使用到類似的依存度？或許依存度的問題是出在研究者如何進行比較性的使用與解釋之上？

<sup>25</sup> 學界內目前對互賴（或「過於依賴」）等等議題的理論或政策攻防，似乎並不理會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對 interdependence 與 (inter) connectedness 的區分、與對兩者間可能關聯的討論；且多半要不是早已直接預設兩岸間已然進展至「經貿往來關係若『斷裂』，將對台灣造成重大成本」的地步，不然就是由此直接上綱至「經濟互賴的（唯一？）終點就只能是政經（制度的）統合／統一」。拿斷裂之成本來說，就算台灣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那中國呢？台灣要基於那些理由／價值來繼續深化這種「斷裂將有重大成本需負擔」的關係呢？或者，台灣只能別無選擇、小心翼翼地「避免斷裂」？但兩岸間的互賴會不會是一種為 Albert Hirschman 所倡、而經 Gasiorowski (1985: 337) 所運用，但此處應視脈絡而稍作適當修改 (mutatis mutandis) 的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至於後一點除應於他文另作討論外，歐盟研究協會前理事長張維邦於生前一篇重要文章 (1995：73-74) 中就曾指出：[後一點若可信，則]台灣在 20 世紀時早就整合進以美日為主的「大平洋經濟圈」！顯然的，經濟圈實非區域之制度整合；就算經濟圈能因台灣文化傳播界諸名嘴之便宜行事，以致被納入區域整合的型態當中，那麼台灣與美日間會否／會否邁向政經統合／統一呢？

些無法克服——以致架構本身在有意無意之間逐漸邁入遭致遺忘的地步 (!?) ——的限制？

以此為問題意識，但在嘗試尋求可能的解答之前，首先讓我們注意到：本文稍早的篇幅中已多次提及對假設或模型的實際／趨真性 (realisticness) 進行改良；那麼此處或有進一步發展式(4)、式(5)的機會與餘地。畢竟，不但  $\delta$  無須背離諸作者們曾經蒐集、表列出來的資料，而仍持續被設定成一個其內元素均為相同常數的向量； $s$  值似乎也應藉由同樣的受訪／調查，以得出足供參考、應用的向量值。針對後面這一點，高長 (1997：171) 實已提及  $s$  此時將會依產業類別之不同而出現差異。當然了，從模擬的角度來看，這兩項擴大的修正所需的「陣仗」不小，不但調查的功夫與所需之經費必然龐大，與其相互配合的模型程式勢必也將臻於複雜之巔；不過容筆者斷言，這實非導致「香火中斷」的關鍵因素！

試想，若吾人將上一段所提及的改良就此重新併入式(4)與式(5)之內，則理論上此一嶄新的  $\delta$  向量不再能如先前一般地繼續引發  $T$  值作出一致的增減，因為  $\delta$  之內元素已非相同的比例常數；但倘若位於中國境內的台商，隨著若干持續深化之中的因素——如中國境內中間投入財產品品質的持續提昇、台商逐漸於中國落地生根以致企業經營「當地化」…等 (高長，2001：147-51；2002a：380-85) ——而幾乎無可逆轉地 (irreversibly) 逐年降低回購比例，則  $\delta$  內諸元素之值的逐年下降乃是一無法避免的實際趨勢！因此其他條件不變下， $T$  將呈現下滑的走勢；除非外流之  $K$  值能夠逐年上升<sup>26</sup> 而反向作出彌補。此外，若全新的  $s$  向量能夠經由調查獲得，也不代表其必然具有極高的可靠性；除非進行訪查時能夠隱瞞  $s$  所代表的替

<sup>26</sup> 不過不要忘了： $K$  之上升又涉及 GDP 之減損。此外， $K$  到底有沒有因為戒急用忍政策而降溫，就連反對該政策者——如傅豐誠 (2001：11)、任克敏 (2002：241) ——也沒有否認；不過，化明為暗之「偷跑者」的存在，會成為主張該政策無效的主要理由；只是，若無效則能降溫嗎？無效是指何種程度？對何種資本主/決策者無效？或無效其實多半出在台灣政府不願——因為有忌諱 (後詳) ——嚴加處罰上？試參酌衛民 (2002：212-13)。

代性涵義<sup>27</sup>。最後但也卻是最重要的，式(5)內區間之  $s$  的設立果真有其不受爭議的合理性嗎？

當今經濟學界內對機會成本的介紹與應用，乃側重於特定市場經濟或價格機能脈絡下，「事前」(*ex ante*) 決策的選擇與考量；換個角度來說，與該脈絡無關的決策，自然與機會成本式的思考不必然——或許也不應——有所牽連。試想一個多年不見、街上偶遇而發生的舊識好友聚餐，若筆者當下決定不僅自掏腰包且大方請客，難道吾等彼此之間註定必皆有各自背後精密的算計——因為午餐不可能白付／白吃<sup>28</sup>?! 與此一假想例密切相容的是：經濟學者向來即主張市場經濟下的選擇決策中，唯有自由財才無機會成本可言。雖然機會成本的概念介紹與運用，多半始於封閉經濟 (*closed economy*)，而當吾人進入開放經濟 (*open economy*) 的篇幅後，也鮮少脫離藉著某些特定經濟體／國家本身的生產可能線 (*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來說明國貿領域內的機會成本；但以此為鑑，則在 (式 4 與) 式 5 的現行架構下，倘若資本外流與母國的國內資本形成之間竟然可能不存在著絲毫的替代關係—— $s=0$ ——這豈不表示在國際經濟 (學) 或跨國經濟往來的範圍之內，天下確有／竟有白吃的午餐，因為由母國外流的資本除了增加資本流入國的 GDP 外，卻能使母國的 GDP「毫髮無傷」？或者表達得更明白一點，跨國流動之資本在國際間可以是自由財?! 若此為真，

<sup>27</sup> 試想受訪的台商若了解到「 $s$  愈大表示對國內產值傷害愈大」，則會作何回答；這其實正是方法論中「反思性」(*reflexivity*) 的問題。

<sup>28</sup> 不過這無法排除下面這一點：經濟學教本由於無法 (或不願?) 區分市場交易決策與非關市場經濟——或甚至非關價格!——之決策間的差異，以致於會以「慵懶的午後應選擇曬太陽、泡澡或看書呢?」來表徵前者的基本型態，並美其名為研究決策或行為的「經濟 (學) 進路」(*economic approach*)；Milberg (2001: 424-25) 在觸及交易成本、廠商內／產業內貿易與「新國際經濟學」(*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脈絡下，對此有著精采的討論。對吾人而言，此處僅須考慮以下這一點：曬太陽、泡澡或看書 (三者之一) 的時間本身若為平面橫軸座標之單位，那麼各休閒之個別需求線的縱軸座標單位為何呢？這不正說明了，休閒或勞動 (供給) 之間時間分配多寡的選擇，的確不同於諸休閒之間的選擇！

則恐怕資本流動或「資本逃離」(capital flight)<sup>29</sup>將不再會是國際經濟學內的正當與緊要課題。

進展至此，筆者還須預先面對一個可能的質疑，畢竟上一段的檢討充其量只針對  $s$  之封閉區間內的最小值；那麼， $0 < s \leq 1$  的段落呢？據我粗略的爬梳，西方經濟學（思想史）內似乎只有 Karl Menger 曾經一度使用到「準自由財／準經濟財」(quasi-free goods/quasi-economic goods) 的概念<sup>30</sup>，但筆者尚無法斷言台灣的兩岸經貿研究者是否正是由此汲取靈感；不過，對於資源或要素在不同用途的取捨中，那被放棄的用途選項內原本最高的可能市價或收入，不正是（最高之）機會成本的普遍定義？也因此，除非（欲外流之）資本在母國國內原本竟無絲毫投資（獲利）機會之選擇，否則權衡赴外投資決策時所須斟酌的正是：在所有母國國內生產性活動／產業中，獲利程度最高的生產選項<sup>31</sup>；這不正應是當吾人置身於當代經濟學脈絡之內時，衡量資本外移對母國之機會成本的正常與正當途徑？再次地，除非吾人割斷替代性在此與機會成本慣常的——或一般認可的——聯繫，或者將機會成本概念原本所預設的單一最高值（或此處之最高程度）模糊化，那麼現今的經濟學理將不至於推論出  $0 \leq s < 1$  於此的適用性。

由此觀之，不論前面曾提及之 20% 的  $s$  臨界值是否已然偏低<sup>32</sup>——因

<sup>29</sup> capital flight 多用來指稱因政經動盪或市場遽變而導致的資本外流；不過其與 capital flow 之混用，也多所常見。

<sup>30</sup> 只是，一般不正是以 Menger 為機會成本概念的奧國學派 (Austrian school) 先驅之一？Rima (2000: 244-45) 確有此說法；至於國際貿易理論中「專屬要素」(specific-factors) 模型的某位先驅——Gottfried Haberler——也在這一個概念上與奧國學派攸關，見 Maneschi (1998: 158-60)。

<sup>31</sup> 進一步的說，除非研究者對機會成本概念所隱含之「保守地評估成本」的性格頗為不耐，因此不再理會一般經濟學的傳統「教誨」(edification)，不然式(3)與式(5)內還可以考慮於該架構內作細步的修正：外流資本（內特別是屬於外移與擴張對照組——見本文前註 20——中之擴張者）應搭配母國國內跨產業 (interindustry) 間資本生產力最高者——而不再是該資本原來所屬的產業——來設算 GDP 之可能減損。

<sup>32</sup> 也因此，當高長在其近作 (2002b: (10 章之) 18-19) 中再次提及「由於資訊不足，我們無法確認臺商在大陸投資…到底有多大程度替代[了]在台灣的投資」時，吾人實應留意到：(1) 如果本文的檢討成立，那麼這些文獻目前的「曝光率」大減也就不令人意

此式(5)本身已顯露出資本外流極易造就出負的淨產值—— $K$  之外移就代表其背後的決策者全然放棄了國內原本最高的可能獲利機會；換句話說，或許調查外移台商的主觀替代感受（向量）不但非屬必要，早先的式(3)—— $s=1$ ——才應是這理論架構內正確運用機會成本概念之途。而在稍早之出土黃金例子裡，這澄清後的機會成本概念將誘導吾人作出如下的追問：該筆黃金若留駐、投資於國內，則其最高獲利率會是多少；而非預設該筆黃金可能與國內的資本形成毫無任何的替代關係。

那麼，本文至此的重點意涵即可綱要式地分述如下：

1. 由式(3)到式(5)之額外添加單一符號的模糊（或機率？）化作法，雖然不甚起眼，似乎卻足以顛覆前者原本所得出之明確——就算還是帶有推估與模擬性格的一結論。但在對後者予以細究之後，卻顯示出吾人對模型假設的修正，並不必然會危及先前「簡化階段」所得出的結論；特別是某些時候——起碼就本文主題而言——假設之趨真化是否曾被適當地予以構思，往往才是關鍵之所在。
2. 也因此，類似於「合成之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警示，於此是個重要的理論「制動閘」（brake）：即便行使資本外流決策<sup>33</sup>的眾多個別行為者，乃透露出彼此之間全然南轅北轍的（外流）替代（國內投資的）程度，資本外流對母國之總體社會／經濟的影響——於此理論架構下——勢將設定為其外流值的全部／全數程度，

---

外，畢竟「 $s$  值無法明確得知」的效果（或前提？）成為某些作者首重的（單一？）要點；(2)但依高長自身對  $s$  值的過往推估，上該文句其實可隨即補上：「[若我們依舊接受衡量資本外流之利弊得失的架構，]則顯然只要發生『少量』的替代，即導致不利的淨效果！」——參考前文對  $s$  之可能臨界值的討論。

<sup>33</sup>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必須進一步了解到，這種決策包括了（宣稱）預備外流之威脅效果（threat effects）的展示，而不是只指向外流的既成事實。除了 DeMartino (2003: 407) 與 Milberg (1999: 105) 均指出了這一點外，後者並引述了 Dani Rodrick 關於先進國內因為跨國企業進行生產之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以致勞工之談判／議價實力（bargaining power）降低的觀點；Davis (1999: 495-97) 對 Rodrick 於此有較完整的檢討。反觀國內，某些與新自由主義採取不同產業政策取向的學者卻在這個面向上「自我噤聲」；是該歸咎於台灣還稱不上是先進國？亦或某些深藏的終極價值使然？

除非吾人有意無意地割捨了機會成本的「傳統訓誨」。必須立即指出的是，筆者並非主張傳統絕對無法「違逆」——否則任何學科將會遲早窒息、停滯——不過顯然的，這些國內的研究者一來並不從屬於較為「另類」的學術社群，二來也無任何明顯的證據足以旁證這些研究者們曾經專門觸及此類「偶像破壞」(iconoclastic)的論點<sup>34</sup>。但假若讀者們依舊堅持理論／模型之優劣良窳無須憑藉對其假設的檢討，則容筆者重提那最為極端而強烈的案例(the most extreme and strongest case)：資本於國際間被形塑為自由財——亦即代表對母國毫無機會成本之傷害——的構想，其實預設了何種成見／先見(pre-judice)<sup>35</sup>，又可能造成何種理論上的影響呢？

3. 退一步的說，就算吾人不願涉入替代之機會成本於此可否模糊化的爭論，而直接接受當下種種的(最終)修正現況，也容筆者大膽地主張：上該的理論架構實已逐漸地「無足輕重」。試想，若研究者堅持此處的替代程度無法得知，那麼模擬的推估數值與質性效果也就隨之千變萬化，則理論上資本外流所導致的利弊淨額當然無法得知；既然無從探知得與失，這般的模型架構又有何持續的重要性、發展的可能性與政策的攸關性呢？以此為憑，現階段教科書與研究文獻內若還能出現這些過往「檔案」的蹤影，其角色要不是多半流

<sup>34</sup> 機會成本是否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概念，抑或其預設了資源的充分使用、「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與「報酬遞減」(decreasing returns)，的確就有某些額外的爭辯在；參閱 Shaikh (1980: 205)少見的討論。試以平面座標上凹向原點的某國／經濟體之生產可能線(PPC, or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為例，若由該線左下側內部——即生產可能集合內部——之 A 點，垂直上移或平行右移——更不用提往右上方移動——至線上之 B 點，則此時究竟有否機會成本呢？無怪乎，不敢／不願割捨充分就業的假設成為多數國際貿易模型的‘Achilles's heel’；本文在這些層面上避開許多極有價值的討論，故請注意正文中討論替代性時所刻意固守的傳統脈絡。但若吾人重視前文之註 8，則亦可發問：動態經濟展下，台灣不需要持續擴張的資本形成嗎？

<sup>35</sup> 或是 Deraniyagala (2005: 99)最近所用的「信念…與信仰」(belief...and...faith)字眼？此外，形塑對母國無機會成本存在之資本外流的構想，有沒有可能與時下文化研究或區域整合研究圈內盛行的「主權過時」說產生聯繫，筆者無法斷言；不過筆者又抱持何種成見／先見，確應留予讀者評判。

於歷史文件般的慎重介紹，就是不忘藉此強調：「無法得出一如往常之明確結論」的結果才應是該理論架構最終（或唯一？）的目標（goal）所在。台灣的兩岸經貿研究學圈日後有沒有可能將這類「不精確性」（inexactness）的構想，一視同仁地擴大運用至本文的主題之外——如兩岸經濟整合的利弊得失、金融資本或「投資組合式資金」（portfolio capitals）之外流——筆者深表懷疑；畢竟如此一來，不論是全盤廢除或延續經貿管制的不同政策建議，其背後所預設的理論判準也極可能隨之模糊化。由於本文所關注的模型架構向來與政策建議取向有著無可分割的關聯存在，吾人實應警覺到：就算其所佔的篇幅依舊如前，實質上早已逐漸淪為修飾性的櫥窗角色——展示之用、而無繼續發展的必要性。更由於在以往的調查、研究過程中，自個別資本外流決策者取得替代程度明細時所遭遇到的困難與限制，被視為此架構必須接受（ $s$  不必然等於 1）的最後建構終點；以致於，這種限制不僅使得無明確結論的目標深植學界人心，更儼然進一步（但意外？）地轉化此目標而成為理論的「終結」（termination/end）之處：既然資本外流無法對其權衡利害得失，則不論在理論發展或政策建議的涵義上，這些過往文獻的重要性勢必旁落。如此看來，若學界並無意願考量本文的檢討所得，（選擇性的？）淡忘其實才會是此模型架構最有可能的終點站<sup>36</sup>。

#### 肆、小結：瞭望台式的展望

如果本文進行至此的檢討基調可以被接受，那麼在這結尾的篇幅中，

<sup>36</sup> 容筆者再次強調：如果吾人將最後焦點集中於  $s$  值之上，並因而接受這理論架構內的修正改良有其終點的想法，則那會是提早出現在式(3)之上；但恐怕正因為對該式之模擬研究，難免會帶出資本外流實為弊大於利的明確結論，因此模糊化的作法——式(5)——現身。只是，這種「解圍之用的事物」（*deus ex machina*）的代價恐怕將是邁向遺忘；而筆者此處戮力所為的也正是防堵此種過程的進一步深化。

即便筆者最後的構思必將有著過於粗糙的嫌疑，那些基本的（大）方向可以指引吾人忠實地面對以上所述的三點引申呢？顯然的，抱持台灣與中國無法擺脫、並應積極促成政經制度統合／統一之終極結局的人士，實難繼續將「無法在事前根據此等理論來推估台資外流中國的淨效果」此類的說法引之為用，畢竟此種將焦點集中於台資外流中國所引發台灣 GDP 之增減的文獻，理應推導出明確的負面結論。退一步的說，遺忘或許也因此並不是某種意料之外的手法，因為這不失為一種解消負面結論之威脅的便捷道路！但縱使便捷，仍難逃便宜行事之譏；因此依筆者之見，此類人士何不轉而正向面對挑戰，並認真論述其政治的終極理想確有機會取代、並抵銷台資外移所造成的淨損失<sup>37</sup>？傳統的國際經濟學內，向來便習於／襲於在比較靜態的脈絡下，假設體系往「自由貿易／經濟」之狀態趨近時，此自由化政策的獲益者在補償（compensate）反向的受挫者後，其福利仍措措有餘<sup>38</sup>；撇開此類福利判準之不具時間性（timelessness）、進行福利轉讓／重分配措施時的中介要角為誰、運用於國際脈絡時易流於「光說不練」…等等問題不談，這一套構想等於必須說服吾人：兩岸的（高層次）「一體化」確有補償台灣單向淨損失——或者套句中國傳媒的用語，因此吾人不

<sup>37</sup> 某些人士或許因為擔心此類說詞過於坦白、也等於承認「中國磁吸」之說絕非無稽之談，因此偏好純由社會心理、歷史情感層面來下手；但依我看，這還算強過「資本外移有助於產業升級」——請回顧本文前註 18——之說。當本土的國貿教科書——如劉碧珍、陳添枝與翁永和（2002：109）——都承認台灣連當下「仍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也加速進行對外投資，造成失業人口驟增」時，我們必須抽絲剝繭的探知：企業決策者進行外移舉動時會否**自然、自願地**（先一步或至少同時）進行國內的產業升級？台灣過去的產業結構轉變是種自由放任市場式的結果嗎？政府為何不能一方面以產業政策引導/促成國內產業升級，一方面搭配以勸阻/力阻大型資本外流特定國家？如果「要外流的產業資本一定會想盡辦法出走」的現況描述，可以外推引申成「因此政府不宜干涉資本外流，畢竟總是治絲益棼」，那麼選擇順從 Jagdish Bhagwati 的信徒們也應該說明：為何金融資本不宜**如此**引申？

<sup>38</sup> 這即是‘the Hicks-Kaldor welfare criterion’ (Daly and Farley, 2004: 316)；另外可注意到，Blecker (2005: 331-32) 最近在觸及 the Stopler-Samuelson theorem 的討論脈絡下，明快的指出：往自由貿易趨進的作法並非一種‘Pareto improvement’。

但不宜「以經害政」、更應耐心等待曙光——的具體可能<sup>39</sup>！

相形之下，那些因明確的負面結論不易消散，以致急於擴大兩岸經貿管制範圍的人士，卻更需要較大的耐心；特別是國際局勢之潮流更加快速地轉化（上一段之）某些人士的終極理想，而形成歷史宿命般的陰影。當 Davis (1999: 503-4) 與 Colander (2005: 102) 在鋪陳全球化、貿易與委外生產 (outsourcing) 對美國所得分配/薪資差距、長期經濟前景的不利影響<sup>40</sup> 後，均又即刻指出他們並不因而贊同重回「保護主義」的論調<sup>41</sup>；相似於此，筆者本身最後所能提供的乃（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疏解之路，目的雖不在全面翻轉「管制即惡、即保護主義」的罪名，但起碼試行以保留本文文獻對象的持續攸關性。

首先，針對現狀而言，台灣的政經體系不（再）似一黨專政之極權／集權體制，除了為數不少的政界與學界人士均標榜為「自由經濟」之外，經貿政策也有隨朝野主客易位而更迭的可能；因此即便本文的文獻對象可以援之以為後盾，戒急用忍此類資本外流管制政策實不應侷限於執政政黨自有政策的辯護範圍，而應試圖進一步轉入對經濟理論的重新思考。也因

<sup>39</sup> 「以經害政」恰巧是「『非經濟』因素干擾兩岸『正常』經貿往來」的對立面；吾人是否應該思考如何不在這些泥沼中繼續疲於奔命呢？本文之匿名審查人所提供之「國家安全」[、或「經濟安全」]議題的額外考量，自然屬於更為全面性的角度，可惜礙於筆者龜速般的論著進度，於此無法處理，唯請審查人與讀者見諒。此外，對於未來發展前景的耐心當然並不預設統合／統一必然是兩岸和平走向的唯一選擇，更應排斥對過往歷史的扭曲；但令人訝異的，某些強調採用新國際經濟學——如 Paul Krugman 等人之說——內之「新經濟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 進路的論著，卻能導出「台灣若早在若干年前便開放兩岸貿易、隨之開放兩岸投資，則如何如何…」的觀點。莫非，「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歷史攸關」(history matters/historical accidents matter) 的概念全然與這些新國際貿易論著無關？若此不然，則我們有必要留意 Martin (1999: 76) 稱其為「黑盒」(black box) 的尖銳批評。

<sup>40</sup> 雖然這類迥異於商業傳媒期刊式的研究須經適當的修改才能運用到國內，筆者目前傾向於其基本的結論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 Krugman 等人之「美國之國際貿易量比例過小，故無法顯著地用以解釋美國國內所得分配惡化」的論點，卻連在非新自由主義的學圈內也大肆盛行。Feenstra and Hanson (2003: 146-85) 對此絕對是個有力的矯正。

<sup>41</sup> 但 Davis (1999: 503) 的行文稍有瑕疵，因為「反對自由貿易」(against free trade) 與「反對貿易」不宜混用；另外，Felipe and Vernengo (2004: 65) 則指出：「…貿易與產業政策…不應被等同於全然的保護主義」。

此，接下來的些許論題希望能釐清我們對台灣兩岸經貿管制政策的一些誤解：

1. 台灣的體制無法嚴厲到全然禁斷資本外流，也無法實施至以「極刑」伺候外流特定國家之企業決策者的地步；但如此這般的現況，卻一再被扭曲為經貿管制即屬無效、而應廢除，就好像只要發生了人車擅闖紅燈號誌之後，吾人即應拆除交通號誌一般！因此，本文文獻所得出的負面結論頗能順勢提醒的即是：台灣基於體制特性，必須容忍資本外流，及對踩犯紅線者予以「從輕量刑」<sup>42</sup>；或者更具體的說，我們無從延宕外流資本之可能「偷跑」、或轉向流入中國的持續可能性。但這決不代表資本外流即應全面解禁<sup>43</sup>！
2. 因體制之現狀特性而容忍資本外流——但外流方向、種類與金額依舊有所限制——的坦承，卻能先一步地防治對戒急用忍政策的刻意扭曲。當台灣成為 WTO 的會員之後，戒急用忍卻還被持續等同於鎖國政策，莫非該政策斷絕了母國資本所有外流的所有可能？難道「中國化」——或中國熱——與全球化即一體之兩面，因此阻擋部分資本進入中國，也就是鎖國這回事或阻擋全球化？看來，鎖國之說若能成立，這大概蘊涵了：在全然撤除與嚴格——且必須毫無漏網之魚——的全面管制之間，吾人只能二中擇一；並且除了母國外，世界其他成員（the rest of the world）中只有一個國家算數<sup>44</sup>！

<sup>42</sup> 那些嘲諷罰則／罰責形同「虛設」、因此不如不對資本外流設防的呼聲，莫非暗示「違者處斬」的作法才是政府當為、言出必行的管制政策？然而，我們卻必須承認：「從輕量刑」確有其現實面、而不得不然的考量——以防產生**威脅**將作資本外流的**擴大與串連效果**；可惜，多數反對戒急用忍的論者眼中只有企業決策者這一經濟行為人。此外，容忍在這裡可以被解讀成對資本主義式生產／法權體系的屈從、或調解（reconciliation），筆者不擬於此爭辯；但容忍之說既然不同於傳統的尊重（市場）之詞，前者也就蘊涵了政府其實將**被迫**對資本外流的結果作制度性的補救，而此截然不同於「自由經濟」將有最高福利結局的老調。可見，「自由經濟」的用語顯然到了應正其名為資本主義的時刻——誠如 John Gray 這位 Hayek 研究的老手所洞悉的一般。

<sup>43</sup> Colander (2005: 96)就無比明白的指出：「實際上美國廠商因為政治性的爭議(political issues)，而[被]限制可以[移轉至]國外進行生產[活動]的數目。」

<sup>44</sup> 這些詰問不宜被轉換成筆者主張中國「不算數」(doesn't count)；唯請注意到，擁抱全球化者經常藉由加入中國的統計數字來美化全球化。參透此點的最佳讀本非 Freeman (2004: 70-73) 莫屬。

3. Colander (2005: 96)最近坦率的指出：「[美國]廠商基於壓力而將生產移往國外，因為他們相信若不如此，則會被排除於中國市場之外，而他國的廠商則搶先而入（head start）…致使美國廠商無法與之競爭」。除了商管業界人士鮮少領悟競爭不宜被化約成「先行者通吃」——擁有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優勢的廠商自應另當別論——之外，劉碧珍、陳添枝與翁永和（2002：341）也陳述道：「[同樣作出外移決策]的資本外移後，帶動海外資本報酬[率]的下降，[更]拖累了原先已在海外投資的同業，使大家的報酬均降低」；這些說法不也額外印證了林維熊（2001：17）稍早之「台商彼此間陷入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判斷<sup>45</sup>並非無的放矢？吾人還能執迷於個人自願／自利之舉也必然相容於社會的理性（societal rationality）嗎？
4. 當國際經濟學必須考慮資本外流的實況時，理論上對貿易／分工型態及所得分配效果的研究，即無法預設比較利益的傳統仍然適用。雖然無法繼續佯裝國際貿易將使所有的貿易夥伴雨露均霑，也無法持續堅持個別國家不會發生「一無所有」（empty-handed；Jones, 1980: 258）——脫離兩財貨模型後，則多指發生長時間的貿易失衡（Shaikh, 1980）——的美好境界依舊存在；兩岸經貿學界長久以來卻充斥著某些「填空」式的慣性思考：對岸生產勞力密集財成品→比較利益使然，我方外移某些前端製程至對岸→比較利益使然，我方出口原料、半製成品至對岸完成近乎成品後回銷我方→比較利益使然，我方某些資本密集財製程開始移轉至對岸→比較利益使然，

---

<sup>45</sup> 可惜，刊載林維熊該文的專欄編輯雖對賽局理論「有所保留」，卻未加置喙；我想，Philip Mirowski 與 S.A. Turab Rizvi 多年來的一些力作均屬必讀的嚴肅討論。至於此處所引用劉碧珍、陳添枝與翁永和（2002：341）書內的原先段落前後，他們並沒有使用到囚犯困境的概念，而是說及：「[因為]資本家只追求自身的利益，不顧社會全體的利益」；但在稍早介紹一種兩國均同時補貼出口的模型時（前揭書：290），他們便明白寫道：「[當]兩國均補貼出口藉以提高福利時，兩國最後將落得兩敗俱傷，[利潤率下降致使]福利都下降的窘境…[是即]囚犯的兩難」。

我方高階／高附加價值之資本或「技術密集」財業主宣稱唯有轉赴中國投資才有明天→比較利益使然。殊不知，要素中間財／非最終成品、委外生產、部分製程移轉、產品或產業之寬鬆定義的取捨、緊密相關企業間‘non-arm’s-length transactions’…等等議題——更不用提國貿教科書對產業內貿易、廠商內部貿易、規模經濟的討論——早已困擾原本認比較利益序鏈（chai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不受影響、分工型態依舊可以輕易決定的西方學界已久。就算自由經濟的宣示必須搭配資本自由流動，依賴比較利益的傳統思考早已受到嚴格的挑戰；更重要的是，當技術狀態、要素「稟賦」多寡受到資本流動影響後，吾人還能天真的認定資本外流下，母國將會自然而然地往「更具」比較利益的高階產業升級嗎<sup>46</sup>？

5. 容忍資本外流卻不代表此起因於「自由經濟」之先天要求，特別是不存在著行為者彼此間只根據「既有的」價格訊息作出決策、彼此間不相互影響決策過程、決策結果只限於自我承擔、資訊完全流通且無不對稱「異狀」的經濟體系<sup>47</sup>。當吾人如此習慣於自由貿易的

<sup>46</sup> Felipe and Vernengo (2004: 49-75) 此文因此值得詳閱。而在筆者所採用的教科書中，資本無法外流的假設依舊在相當居後的章節中才獲得解除，且作者們——劉碧珍、陳添枝與翁永和（2002：340-41）——自然強調：只要「海外所得的總報酬扣除國內[因外流而引起之]生產的減少…，資本外流對[母]國有利則是千真萬確的事」；Prasch (1995: 427-33)對這種樂觀見解有獨到的解析，雖然他批評的對象是 Krugman 與 Maurice Obstfeld 這對搭檔。此外一個非常相關的說法是：取消戒急用忍將有助於維繫兩岸間的「垂直分工」；這到底是不是種「一味…將[中國]大陸視為[台灣]淘汰夕陽產業的基地」的想法（任克敏，2002：297），當然值得探究，特別是中國的學界人士亦表達過對此的反感——參見衛民（2002：160）所引述之余克禮。且讓我們額外追問：為何台灣資本外流中國會（持續）擁有此功效呢？「水平分工」又為何於此被排除？特別是中國境內的外資並非只有台資，後者不可能隨心所欲地以資本外流來營造號稱對台灣有利的分工局面。此種同樣樂觀的邏輯極類似於「(期盼)台商能在中國內部發揮『特洛伊木馬』作用」的論調，而此論調不正輕視了「以商促統」(的病毒?)卻早已反向地蔓延開來的嚴重性？

<sup>47</sup> 當今的經濟學總是先一步堅持經濟循環體系內的主角是為個別、而獨立的行為者；但要素市場章節與總體經濟學內對所得收入的分類，卻曝露出背後因著生產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而來的階級分類。與市面上一般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論者不同，Blecker (2005: 332)顯然對此了然於胸，故他指出：「當[福利之]實際補

用語之際，Herman E. Daly 多年來不正不遺餘力地提醒道：「誰能 [在這種 ‘free trade’ 的標籤下] 反對自由 (freedom) 呢？」(Daly, 1995: 322；參見 Daly and Farley, 2004: ch. 18) 爲了突顯去管制並不必然是項可取的政策，Daly 向來偏好的取代用語（或標籤？）乃是「去管制的國際商業」(deregulated international commerce)。雖然各有千秋，筆者建議以資本主義的指涉，即能取得類似的目的；一來我們可以脫離膠著於自我決策即是最大自由的窘境，並且回歸資本主義才是容納各種市場型態分析之最大歷史公約數的理論之路，二來環顧世界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則我們更能正視到即便是英國，也並不是「自始至終」的全然蛻除管制政策 (Chang, 2003)。如果政府政策向來皆非資本主義式發展的重要內在因素與貢獻，那麼發展經濟學內近十多年來 ‘getting the prices wrong’ 與 ‘getting the structure right’ 的說法又有何解釋力呢？因此，以本文爲背後的支撐理據，我們何不自問：此時此刻，對台灣來說，大型資本外流特定國家的管制，真的到了可以視之爲應該盡快踢得遠遠的梯子 (ladder) ——套句 Ha-Joon Chang 近作常用之標題——了嗎<sup>48</sup>？

---

償付之闕如時…某些社會階級之支持保護主義將有其理性的自利[爲後盾] (in the absence of such compensation actually being paid,...there are social classes who have a rational self-interest in supporting protectionism...)

<sup>48</sup> 這樣看來，最後我們顯然應歸功於、但批判性地借重傅豐誠 (2001: 13-14；重點爲筆者所另加) 下述敏銳的觀察：「在過去兩岸經濟互賴加深的過程中，固然**沒有**發生產業空洞化的現象，但並不代表**未來不會**發生…，[一些]趨勢可能更令人憂心。根據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理論，**兩岸資本能夠自由流動後**，將使台灣低技術勞工的就業機會減少，薪資…甚至下降；…即使台灣產業升級順利…其結果雖未必會造成台灣平均工資的下降，但會造成高低技術勞工薪資[差距]的擴大」。雖然要素價格均等定理原來的推論乃預設了資本無法流動（等嚴格假設）、並且是用來說明貿易即能「替代」要素流動（而使國際間之要素絕對價格趨於一致），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作者於此段落前後並未明說是何等因素使**兩岸**資本可以或必須自由流動；依其兩岸資本之用詞，似乎導向一種國內曾經出現的誤解，即「兩岸均加入 WTO 後，兩岸間的貿易與投資均須雙向自由流通」。不過，GATT/WTO 的規範或條款並沒有包含「母國不得對資本外流設限」，否則作者之「戒急用忍應該大幅調整，並儘快廢除」的主張不就多此一舉？倘若我們將焦點回歸台灣，那麼資本**自由**外流或許是該作者所另外提及之「化明爲暗」或「向政

---

府施壓」的結果；但其引發之薪資差距擴大或失業的問題，作者為何又認為須由政府「集中心力解決」呢？為何這不是種**自由**經濟下的必然趨勢，因而原本就應由經濟行為者——尤其是勞動者——**自行**承擔呢？特別是此處的財產權界定異常清楚，政府又何必對自由經濟運作的結果予以「干預」式的補救？莫非資本須自由外流，但其結果先天就理應交由政府來「收尾」？

## 參考書目

- 任克敏。2002。《中國大陸經改理論與兩岸關係》。台北：高立。
- 林維熊。2001。〈戒急用忍與台灣企業競爭力〉《經濟前瞻》73期，頁15-18。
- 高長。1994。《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台北：五南。
- 高長。1997。《兩岸經貿關係之探索》。台北：天一。
- 高長。2001。〈製造業赴大陸投資經營當地化及其對台灣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7卷，1期，頁138-73。
- 高長。2002a。《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三版）。台北：五南。
- 高長。2002b。〈兩岸未來經貿整合〉收於《2002年兩岸政治與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
- 許松根。2000。〈中國的出口擴張、產業成長與升級〉中研院經濟所研討論文。
- 張維邦。1995。〈「國際經濟整合」的概念與界說：兼評「中華經濟圈」、「華南經濟圈」的提法〉《法政學報》4期，頁61-76。
- 張榮豐、史惠慈。1989。《大陸投資環境及兩岸潛在投資關係之研究》。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傅豐誠。2001。〈戒急用忍政策應該調整〉《經濟前瞻》期，頁73期，頁7-8。
- 瞿宛文。1999。《公與私之間：台灣經濟發展的另類思考》。台北：天下雜誌。
-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雜誌社。
- 瞿宛文。2005。〈如何評估外資功過〉《讀書》（中國）314期，頁13-22。
- 衛民。2002。《台灣·中國·大崩壞？——主權爭議下的兩岸關係》。台北：海鴿文化。
- 劉碧珍、陳添枝與翁永和。2002。《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台北：雙葉。
- 嚴宗大、林昱君與鍾琴。1992。《台商大陸投資及貿易之研究》。台北：經建會經研處；中華經濟研究院受託研究。
- Blecker, Robert A. 2005.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fter Robinson," in B. Gibson, ed. *Joan Robinson's Economics: A Centennial Celebration*, pp. 309-5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Boland, Lawrence A. 2002.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 in W. Lazonick, ed. *The IEBM Handbook of Economics*, pp. 608-22. London: Thomson.
- Chang, Ha-Joon. 2003.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Neoliberals Rewrite History." *Monthly Review*, Vol. 54, No. 8, pp. 10-15.
- Colander, David. 2005.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Trade and Outsourcing."

- Challenge*, Vol. 48, No. 1, pp. 94-103.
- Daly, Herman E. 1995. "Against Free Trade: Neoclassical and Steady-Stat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Vol. 5, No. 3, pp. 313-26.
- Daly, Herman E., and Joshua Farley. 2004.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Davis, John B. 1999. "I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 Important Cause of Increasing U.S. Wage Inequality? The Interaction of Theory and Polic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7, No. 4, pp. 488-506.
- DeMartino, George F. 2003. "Free Trade or Social Tariffs?" in J. Michie, ed. *The Handbook of Globalisation*. pp. 402-12.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Deraniyagala, Sonali. 2005. "Neolib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ound Economics or a Question of Faith?" in A. Saad-Filho. et al., eds.,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pp. 91-105. London: Pluto Press.
- Deraniyagala, Sonali, and Ben Fine. 2001. "New Trade Theory versus Old Trade Policy: a Continuing Enigm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5, No. 6, pp. 809-25 .
- Feenstra, Robert C., and Gordon H. Hanson. 2003.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Rising Inequality: A Survey of Trade and Wages," in E. K. Choi,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p. 146-85. Oxford: Blackwell.
- Felipe, Jesus, and Matia Vernengo. 2004. "Demystifying th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No. 4, pp. 49-75.
- Freeman, Alan. 2004.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in A. Freeman, and B. Kagarlitsky, eds. *The Politics of Empire: Globalisation in Crisis*, pp. 46-83. London: Pluto Press.
- Gasiorowski, Mark J. 1985. "The Structure of Third Worl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2, pp. 329-40.
- Hands, D. Wade. 2001.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usman, Daniel M. 2001. "Explanation and Diagnosis in Economic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55, No. 3, pp. 311-26.
- Jones, Ronald W. 1980. "Comparative and Absolute Advantage."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tatistik*, Vol. 116, No. 3, pp. 6-16.
- Maneschi, Andrea. 1998.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Martin, Ron L. 1999. "The New 'Geographical Turn' in Economic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3, No. 1, pp. 65-91.

- Milberg, William S. 1996. "The Rhetoric of Policy Relevanc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Vol. 3, No. 2, pp. 237-59.
- Milberg, William S.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Balancing Costs and Benefits," in UNCTA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ssues for the 1990s*, Vol. 11, Geneva: UNCTAD.
- Milberg, William S. 2001. "Decentering the Market Metapho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S. Cullenberg, et al., eds. *Postmodernism,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pp. 407-30. London: Routledge.
- Mirowski, Philip. 1989. "How Not to Do Things with Metaphors: Paul Samuelson and the Scienc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Vol. 20, No. 2, pp. 175-91.
- Prasch, Robert E. 1995. "Reassess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Impact of Capital Flows on the Argument of Laissez-fair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9, No. 2, pp. 427-33.
- Rima, Ingrid H. 2000.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alysis*, 6<sup>th</sup> ed. London: Routledge.
- Shaikh, Anwar. 1980. "The Law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E. J. Nell, ed. *Growth, Profits and Property: Essays in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204-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ikh, Anwar. 1999. "Free Trade,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in J. Eatwell, ed. *Global Unemployment: Loss of Jobs in the '90s*, pp. 59-78. New York: M.E. Sharpe.

# Towards Oblivion? A Preliminary and Selective Assessment of Taiwanese Studies of the Cross-Straits Trade and Investments

Feng-jung Shi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akming College,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and assess, mainly from a methodological viewpoint, some selected Taiwanese studies on cross-straits trade and investments which have been influential and widely excepted in some textbooks.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these works share common framework of modeling the net effect of Taiwan's capital outflows into China upon the former's GDP. Aside from explicating major intra-developments in the works, 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issue that the latest revision of the key assumption for modeling substitution between capital outflows and domestic investments infringes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opportunity costs considered properly, and makes capitals more likely to be treated as free goods trans-and-internationally; thus further undermines these works in terms of their value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f we keep on conforming to the well-known economics edification-‘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reasonably, then the assertion of ‘we cannot infer an exactly net effect of capital outflows on Taiwan's GDP in advance’

---

\* fjshih@anet.net.tw.

should not be taken at its face value.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a tentative argument against abolishing straightaway the policy of ‘patience over haste’ would be proposed; and a critical question would also be raised, that is,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sense should we endure capital outflows?

**Keywords:** the cross-straits trade and investments, capital outflows, opportunity costs, policy of ‘patience over haste’.